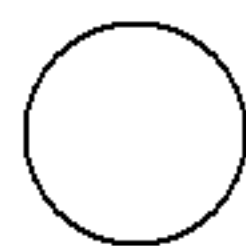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2



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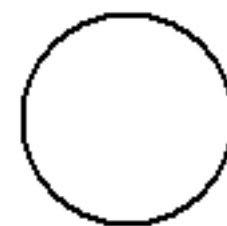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

目 录

社 论	反对美国反动派 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	(1)
	真理是具体的	張世英 (5)
論	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 若干問題	何祚麻 (13)
	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	吳介民 (25)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李潤之 (33)
	肯尼迪的命运(漫画)	米 谷 (4)



☆ 一月十六日出版 ☆



——社 論——

反对美国反动派 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

美国統治集团正在援用臭名远揚的“麦卡倫法”和“史密斯法”加紧迫害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发表了声明，坚决譴責肯尼迪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坚决支持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人的野蛮行为，充分暴露了肯尼迪經常玩弄的“民主”、“自由”、“全民福利国家”等等口号的虛伪性和欺騙性。

在美国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社会里，美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力量本来就没有多少活动的自由。在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下，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早已被剝夺了参加竞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宣傳自己的主張。美国共产党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杂志、报纸、电台、剧团等与宣傳有关的各項行业都不允許共产党员就业，共产党员也不許充当教授和教員；許多进步的教授和教員，仅仅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就遭到解职。現在，肯尼迪政府援用“麦卡倫法”和“史密斯法”加紧迫害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把美国共产党宣布为非法的組織，并且可以任意地对美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正直的美国人判处很重的徒刑或永远付不完的罰款。这样一来，美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进步人士原来仅有的一点点自由，也就被剝夺淨尽了。

美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力量在美国沒有活动的自由，但是像“三K党”、“約翰·伯奇协会”这样的法西斯組織，却可以自由地进行猖狂的活动，甚至“納粹党”也可以自由地存在。在美国已經形成了一个法西斯网，它肆意侵害人民的安全。不只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且所有正直的美国人，都一貫受到法西斯势力的迫害和威胁。誰只要对壟断資本集团的反动政策表示一点不滿，就会被随便加上罪名而判处徒刑和罰款，甚至于受到特务的暗害。美国宪法上規定的保障言論、出版、集会和請願等等民主权利，完全是一些空話。实际上，美国宪法上一些虛有其表的关于民主权利的規定，早已被国会所制訂的各式各样的法西斯法律所代替了。美国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反动政府的特务監視和控制下，随时有丧失工作甚至被逮捕和被杀害的危險。例如，“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这个所謂“防范外国間諜”的特务机构，就可以随时随地对他們所怀疑的人进行傳訊，甚至用“藐視国会”的罪名加以拘禁。任何人一旦



被这个委员会傳訊，就往往意味着失业和困苦，因为許多企业和团体，不願留用或拒絕任用有过“非美活动”罪名或者是具有“非美活动嫌疑”的人。据“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一九五七年的报告，美国就有一百多万人、二百多个組織在所謂参加“顛复活动”的罪名下受到迫害。据不完全的統計，被“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列入所謂“顛复性”团体名单之中的团体有六百多个。由此可見，肯尼迪吹嘘的美国式“自由”，就是掌握政权的美国壟断資本集团任意剝夺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就是美国反动派迫害美国进步力量的自由。

在这个所謂“全民福利国家”里，一小撮財政寡头控制着全部生产資料和整个国家的財富。他們以无止境的剝削从劳动人民身上每年榨取几百亿的金元。据《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的材料，一九六〇年美国的公同利潤就高达四百五十亿美元。这些壟断資本家，过着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例如，美国八大財团之一的梅隆財团的头子保罗·梅隆，为了把他的继女介紹給社交界，竟花费一百万美元的巨款，举行了一次号称“世界历史上空前豪华的”宴会。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經常面临失业和飢餓的威胁。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美国統治集团自己也承认，完全失业的人数，有时候达到五百七十万以上，即使在所謂“繁荣”的一九五九年，也有三百八十万人完全失业。肯尼迪竟然认为，保持百分之四即三百万左右完全失业的工人是“合理”的。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一方面，积存的“剩余”农产品总值达一百亿美元之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却要忍飢受餓。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在十戶美国家庭中，有一戶的饮食不足，甚至低于标准营养需要的三分之二”。正是在这个“全民福利国家”里，据美国报刊的报道，有众多的家庭收入不足以維持普通水平的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家庭負債。截至一九六一年底，美国消費者的債務总額已高达二千九百亿美元。一九五五年以来，負有分期付款債務一千美元以上的家庭的数目增加了一倍。由于还不起債而宣告个人破产的案件，一九六一年便有十三万一千起之多。肯尼迪所謂“全民福利国家”的鬼話，絕不能掩盖美国社会貧富极端悬殊的真实情况。

总之，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残酷的統治，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号称“民主”、“自由”、“全民福利国家”的美国的真相。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过是出現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对孿生弟兄，它們无论那一个执政，都忠实地执行着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意志。肯尼迪的民主党，尽管标的是“民主”的牌号，却絲毫也沒有民主的气味。人們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民主党在負責鎮压美国革命运动方面，比起共和党来絲毫沒有逊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反对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美国人民的大規模的鎮压，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进行的；“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成立的；“史密斯法”、“麦卡倫法”的通过，也是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而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不久，美国反动派又利用这两个法西斯法案，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民主党的“民主”牌号，只不过



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用来欺骗美国人民掩盖它的丑恶活动的一块破布而已。无论肯尼迪用什么漂亮的言词来加以粉饰，都不能改变这个所谓“民主”的党的坏名声。民主党政府同共和党政府在压迫和奴役美国人民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什么区别。福斯特同志说得好，“美国政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所说的‘资本家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是全人口里一小撮人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它唯一的目的是扩大那已经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华尔街利润，是推进大资本控制世界的法西斯和战争的疯狂计划”。

肯尼迪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要把美国的这种“自由”和“民主”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最近以来，肯尼迪在一系列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所谓“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在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国情咨文”中，又一次地吹嘘这个“自由选择”的原则。一个在国内实行暴力专政疯狂迫害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帝国主义者，难道在对外政策上真的能够尊重别的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么？不难看出，肯尼迪的所谓“自由选择”，就是颠覆以卢蒙巴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就是破坏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就是要扼杀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古巴，就是要消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一句话，就是由美帝国主义自由地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去反对各国人民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

肯尼迪政府为了摧残美国共产党，硬给美国共产党加上所谓“外国代理人”的莫须有的罪名。这完全是恶毒的污蔑和捏造。美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美国从它建国一开始，由于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并且越演越烈。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在血的教训之中，美国工人阶级懂得了，要打碎资本主义的剥削枷锁，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组成自己的战斗司令部，这样，也就产生了美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复灭的命运，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寄生性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论断的正确。美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合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的斗争的需要。美国政府想从这里找到美国共产党是“外国代理人”的“根据”，这只能是徒劳的。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是没有国界的。在历史上，美国独立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的政体，就是法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运动者的学说影响下的产物，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反过来又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火焰，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起草人权宣言的指南。如果按照肯尼迪政府的逻辑，那末，岂不是就要把华盛顿和杰弗逊说成是“法国的代理人”？岂不是就要把法国的大革命说成是“美国代理人”制造的“暴乱”？这显然是荒谬的。

肯尼迪政府对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力量的迫害，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希特勒曾经采用过



的手法。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德国各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希特勒被德国大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拥上了台。希特勒一上台，就制造了所谓“国会纵火案”，对德国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把德国共产党打入地下。随后，便以反共为口实，疯狂迫害德国的民主力量和广大人民。工人和进步人士成批成批地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惨遭杀害。在反共的幌子下，希特勒使德国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放手地进行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的暴行，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步希特勒的后尘。因此，全世界人民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



肯尼迪的命运

米谷

现在，世界斗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再像希特勒那样任意横行霸道了。如果说，二十多年以前，世界上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希特勒还可以猖狂一时，那末，今天的时代已经和二十多年以前大不相同了。美国反动派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力量，并不表明它的强大，反而说明它的虚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十分衰朽，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它与世界人民为敌使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上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所推行的内外反动政策，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肯尼迪要向历史的潮流挑战，只能是像唐·吉珂德向风车作战一样，将落得一个惨败的结局。不管在人民革命事业的面前，会出现怎样的曲折和困难，但只要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美国的未来绝不属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而是属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大众。



真理是具体的

· 張 世 英 ·

“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所再三強調的这一真理观，是馬克思主义認識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可以說，我們認識的目的就是要把握具体真理，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

• • •

什么叫做“具体”呢？这里所謂“具体”，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中所說，是指的“許多規定的总结”或“多样性的統一”。与这里的“具体”相对立的“抽象”，是指孤立、片面、割裂、空洞的意思。

真理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具体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具体性，經過一个認識过程，在人的头脑中再現出来，就成为真理的具体性。

馬克思曾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生产是否可从分析人口着手的問題为例，來說明事物的具体性。他指出：人口是“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①。人口是由阶级构成的，如果抛开人口所由以构成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認識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資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話。而这些因素又以交换、分工、价格

等为前提。譬如說資本，如果沒有雇佣劳动，沒有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必須具体分析构成人口的这一切因素，弄清它們之間的內在联系，那么，人口这一“渾沌的表象”才能变成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如果我們抛开了人口所由以构成的这許多复杂的規定，那么，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东西。人口如此，其他任何具体事物也莫不如此；它們都是“許多規定的总结”或“多样性的統一”，都是“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絕對單純的、孤立的東西是抽象的，因而在现实界是不存在的。

具体的东西虽然具有許多方面、許多規定，但这許多方面和許多規定并不是紛然杂陈的，它們实际上是許多彼此对立的方面；具体的东西就是由这許多对立面构成的。因此，具体的东西既可說是“多样性的統一”，又可說是“对立面的統一”。列宁說：“事物（現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統一。”^②“任

① 《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頁。

② 《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頁。



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余的一切处于相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①列宁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把“具体的东西”规定为“自身”与“他物”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所谓“自身”，是指一事物的现存状态或性质。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所谓事物的“自身”，也可以说，就是指这个规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他物”就是指该具体事物的否定的、与“自身”相反的、不对该具体事物的性质起规定或决定作用的方面。

列宁关于具体的东西既是自身又是他物的定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事物的否定方面，是该事物自身内部的不可缺少的构成环节。形而上学不理解这一点，它总以为世界上的事物只能是单纯的：自身就是自身，他物就是他物，“非此即彼。”辩证唯物主义令人信服地证明，现实界并没有“非此即彼”、自身排斥他物的抽象事物，而只有“亦此亦彼”、自身包含他物的具体事物。

懂得了上面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在该事物自身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它；离开了该事物同它的对方的矛盾统一，而单纯地从它自身去理解它，则我们对它的理解只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没有和它作对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生”和“死”是两个明显对立的现象，但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没

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③“生”这个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生”，生物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包含着一部分衰老细胞的死亡，所以“生”是包含自己的“他物”（对方）——“死”在自身之内的，“死”是构成“生”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生”，就要从“生”和“死”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否则，我们对“生”的理解就是抽象的。又如，要具体地、深刻地理解资产阶级，也得从它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统一中去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的阶级，决不可以混淆两者的界限，但它们又是互相关联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之为资产阶级，就在于它既需要无阶级的存在，又需要剥夺无阶级的生存权；所以，脱离了资产阶级与无阶级的这种又斗争又统一的关系，而单纯地就资产阶级本身去看资产阶级，便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有具体的、深刻的理解。

总之，具体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许多规定的总结”或“对立的统一”的如实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认识过程时说：“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0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6页。



去把握周圍世界的发展。”^①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說的論理的認識，也可以說，就是对于具体真理的把握。

* * *

真理是具体的，是“多样性的統一”；但是，要达到把握具体真理的目标，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經過一个漫长曲折的認識过程。

客观的具体事物，作为“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摆在認識的主体——人的面前。人在實踐中必然要对它进行認識活动，它是認識的出发点；沒有它，就談不上認識，認識正是对它的反映。人在認識过程中，首先通过生动的直观，看到它，听到它，感触到它。所以馬克思說，这个作为“多样性的統一”的具体事物，“在現實中是出发点，因此也是直观和表象的出发点”^②。

但是，通过生动直观所能認識到的，还只是关于这个具体事物的表面的、現象的东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还只是关于这个具体事物的整体的“渾沌表象”^③；具体事物还远未能作为“多样性的統一”，即未能作为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呈現于人脑之中。这时，人对具体事物的認識，还只是处于感性阶段。

为了使我們的認識向着把握“多样性的統一”这一目标接近，就不能停滯在生动直观的感性阶段，而必須发展到把握住事物的全体、本质、内部联系的理性阶段。这

首先就需要进行“抽象活动”，也就是說，需要对生动直观中所得到的“关于整体的渾沌表象”加以分析，以便把它分解为个别的、简单的部分或方面，单独地、逐一地加以考察。还是以馬克思所举的人口一例來說明。馬克思指出，我們对人口的認識在开始时只有一个关于它的整体的“渾沌表象”，至于对人口所由以构成的各种規定性，如阶级、雇佣劳动、資本等等，則尙无所知，这时，我們对于人口的認識便是很空洞的。为了使我們的認識向着把握人口这一作为“多样性的統一”的具体事物的目标接近，我們就得进行“抽象活动”，对人口的整体“渾沌表象”加以分析，分析出构成人口的上述各种規定性；随着这种分析活动的进行，我們所把握到的事物的諸規定就越来越淺显，越来越简单。

但是，仅仅停留在这种“抽象活动”的阶段，还不可能达到把握具体事物的目标。因为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决不是一些简单規定的偶然堆集，而是作为“許多規定的总结”的整体，而“抽象活动”則不过是从这个整体中逐一地抽取其一部分，使它脱离和該整体其余部分的錯綜复杂的联系，单独地对它加以考察。当然，我們所进行的“抽象活动”，与形而上学意义下的“抽象”是有区别的。形而上

①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5頁。

② 《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頁；中譯本未将这两句譯出。

③ 同上书，第162頁。



学意义下的“抽象”是把事物看成为孤立的、片面的、互相割裂的东西。而我們則是把“抽象活动”当做認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我們停留在“抽象活动”的阶段,即是說,只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分解,将其各个規定或方面分別地、单独地加以考察,那么,我們不仅不可能对具体事物的整体具有全面的、深刻的認識,而且,由于尚未从这一方面与別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中去考察某一方面,因而也就难免对一个方面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認識不清,也就难免产生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学見解。所以,为要把握具体事物,我們还必须再进一步把“抽象活动”中所得来的諸简单規定,按照它們在客观事物中本来的复杂关系,如实地結合起来、統一起来,即进行綜合,使具体事物的整体呈現于头脑之中;可是这次呈現于头脑之中的整体,不再像認識开始时那样只是一个“渾沌的表象”,而是“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了。至此,我們就可以說达到对于具体事物的深刻的、具体的認識了。

我們的認識之从抽象到具体——从最簡單的規定到具体事物作为“許多規定的总结”呈現于头脑之中,乃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在“抽象活动”中所得出的最簡單的規定(方面),是和具体事物的整体中的其余諸規定隔离开来的,因而也是最抽象的。以后,我們便逐步地使一个規定或方面与越来越多的其余的規定或方面,按照它們在客观事物中实际存在着的复杂关系結合起来,統一起来。这样結合起来、統一起来的方面愈多,我們对

該具体事物的概念就愈具体。

关于这种从抽象一步一步地走向具体的思維过程,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資本論》对資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事物的把握,就是从“商品”这一简单的、抽象的規定开始的。从“商品”出发,然后,《資本論》就进入到了“貨幣”的概念,“貨幣”包括“商品”在內,但“貨幣”这个概念包含着“商品”和其他規定性的联系和关系,“貨幣”这个概念的内容比起“商品”来較為复杂,因而它也是一个比“商品”較為具体的概念。在論述了“貨幣”之后,《資本論》就进入到“資本”的概念,“資本”包括“貨幣”在內,但“資本”这个概念包含着“貨幣”和其他規定性的联系和关系,“資本”这个概念的内容比起“貨幣”来又較為复杂,因而它又是一个比“貨幣”較為具体的概念。《資本論》由“商品”到“貨幣”,由“貨幣”到“資本”,以至最后到达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把握;这样,資本主义这一作为“多样性的統一”,作为“一个丰富的、由許多規定和关系形成的总体”的具体事物——資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便如实地呈現于我們的头脑之中了。

上面所說对直观中的“渾沌表象”进行分析的活动,以及将分析所得出的簡單抽象規定加以結合和統一的活动,即綜合的活动,都是思維活动。我們所說的理性認識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包含这两种活动在內的思維活动。思維活动,从一方面來說,不像生动直观那样与客观具体事物发生直接接触,而是“离开”



了具体事物；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思维活动使我们接近和把握具体真理，使具体事物呈现于头脑之中。所以这种“离开”，乃是以一种迂迴曲折的方式向具体事物接近和前进。列宁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

列宁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相对于生动直观的整个思维活动，亦即相对于感性认识阶段的整个理性认识阶段；他所说的“科学的抽象”，就是指的不脱离实际内容、不抛弃多样性的抽象。与“科学的抽象”相对立的还有形而上学的抽象，即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是认识真理的障碍。列宁之所以强调“科学的抽象”，就是要我们在思维活动中，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对许多不同的规定加以总结，从多样性中抽引出它们所固有的统一性。所以，只有科学的抽象才能更加接近具体真理，而不是“离开”具体真理，才能使具体事物作为“许多规定的总结”呈现于头脑之中，从而让我们“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具体事物虽然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但要如实地精确地认识它，要获得一个关于它的具体概念，却需要经过上述的过程。所以，具体事物决不是一开始时就呈现于思维之中的；具体事物之呈现于思维，乃是思维的过程和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在思维中它（指具体事物——引者注）表现为总结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② 那种以为具体真理可以在认识开始时就一下子把握住，而不需要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综合的观点，是错误的。

简单接受了一个现成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并不等于就算是真正把握了具体真理。黑格尔曾经举了文法做例子：文法本来寓于具体语言的“多样性”之中，但对于初学一种语言的人来说，文法乃是一个脱离了“多样性”的“统一”，是脱离了具体内容的结论和原则。因为他还没有学具体的语言，文法对于他是很抽象的，不过是些僵死的、空洞的骨骼。但是等到已经学习了该种语言之后，如果再回头来温习一下初学时老师所教的同样一些文法，那时，他就会对这些文法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就会觉得这些文法很具体。为什么同样的文法在初学时觉得它很抽象、很陌生，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而在学习了具体語言之后,又觉得它很具体、很亲切呢?这就是由于,在前一种状况下,它是脱离了“多样性”(具体語言)的“統一”,或者說是沒有经历过“多样性”的“統一”,而在后一种状况下,它則是包含了“多样性”在内或者說经历了“多样性”之后的“統一”。

黑格尔在举上述这个比喻时說道,真理(他把真理唯心主义地看成是“絕對理念”)“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①。列宁在《哲学筆記》中称赞黑格尔的这个比喻“微妙而深刻”,并且称赞黑格尔关于多样性的統一的概括是一个“絕妙的公式”。从列宁的这些摘引和批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們平常說的对某一个論断理解得很抽象,那就是因为我們还不知道这个論断(普遍性、統一性)所包含的实际內容(特殊性、多样性);当我们說对某一个論断理解得很具体时,那就是因为我們已經知道这个論断所包含的实际內容了。

常常被大家提起的列宁讀拉薩尔的《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事,也說明了这个道理。原来在列宁以前,馬克思已經讀过拉薩尔的这部著作,馬克思把它叫做“‘小学生的’作文”,认为“不值得一讀”^②。但尽管馬克思的結論本身是从拉薩尔原书的实际內容中抽取出来的东西,当列宁尚未讀原书时,馬克思的結論对他來說,就是一个脱离多样性的統一,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列宁对这个結論的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因此,当他认为在思想战綫上有必要时,

他便不辞劳苦去仔細閱讀拉薩尔那本又臭又长的书,并作了摘要。尽管他在讀完这本书之后所得的結論和馬克思的一样,即认为“拉薩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讀”,但这个結論現在对列宁來說,已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经历过多样性的統一,一个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一个包含着具体內容的結論。

* * *

在关于如何把握具体真理的問題上,有一种看法是极端錯誤的,这就是抓住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而无視那貫穿于其中的統一性、普遍性或总的原則;只不过看到事物的一个片面,甚至一个极細小、极不重要的片面,就把它当做全部真理。这只能叫做抽象看問題,不能叫把握了具体真理。

黑格尔在《誰在抽象地思維?》一文^③中,曾經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來說明什么叫做具体的真理,什么叫做抽象的思維。我們挑其中一个例子來說說。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說:“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女商贩恼火了,就大罵这位女顾客一頓:“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媽媽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像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总之,她把这位女顾客罵得一无是处。

① 轉引自列宁著《哲学筆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頁。

② 参看上书,第385、402頁。

③ 見《学习譯丛》1957年第2期。



黑格尔认为，这位女商贩就是一个抽象思维的人，因为她不知道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是多方面的统一；她对顾客的一切情况并不了解，仅仅因为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就抽象地把顾客当作一个坏人，从头到脚，从本身到亲属骂得全都沾上了臭蛋的气味；这位女商贩的思想方法，正是一种以一概全、抓住一个片面就认为是全部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就是“抽象思维”。

我国古代战国时期，魏将庞涓领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著名军事家孙臆领兵救援。孙臆施了一个计策，命令齐兵进入魏地后，第一天做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又减为两万。庞涓看了，以为齐兵害怕魏兵，所以进入魏地三天就逃亡过半，于是猛追齐兵。追到马陵，中了孙臆的伏兵计，被打得大败，庞涓也自杀了。庞涓落得如此下场，就因为他仅仅看到减灶这个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变动，即匆匆得出结论，认为“齐兵畏魏，入吾地三日，逃亡者已过半矣。”庞涓完全不考虑减灶这个变动在大的军情判断中起什么作用，有多大意义，只抓住一点，就轻率地做出大的结论。庞涓之不智就在于他作了“抽象思维”，没有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不知道从整体看问题，从多样性的统一中看问题，抓住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者一种现象，就以为是事情的全部，这正是抽象思维，是片面看问题。我们平常所说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也就是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当然是

不可能说出或把握任何真理的。

列宁所规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把握具体真理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①“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②。列宁所规定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一具体概念，就是由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许多主要规定彼此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概念中，列宁正是从各个方面、各个规定的统一和相互联系中，而不是从某一个片面来说明帝国主义的。反之，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所下的帝国主义的定义，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抽象的。考茨基说：“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③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武断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武断地、错误地把这个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

②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页。



問題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資本联系起来，又同样武断地、錯誤地強調了兼并农业区域这一点”^①。从列宁对考茨基的定义的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具体性就在于它的全面性；片面性是与具体性不相容的。

任何总的、普遍的原则，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具体真理。人們对具体事物进行概括，得出某个总的、普遍性的原则，也就是得出了某个具体真理。这个总的、普遍性的原则又可以指导我們去認識具体事物。当我们运用这个原则时，必須結合当前特殊的、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使总的、普遍的原则具体化；如果不顾当前特殊的、具体的情况和条件，生搬硬套这些总的、普遍的原则，那就是把普遍原则变成不可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就是抽象地对待具体真理。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在联系当前特殊情况 and 条件来运用总的、普遍的原则时，也一定要从多样性的統一中看問題。客观事物中所包含着的許多方面并非都居于同等地位，都具有同样意义。它們中間总是有些方面对于总的原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本质的意义，这些方面如果有了改变，总原则也要随之加以修改；可是另外也有許多方面对于总原则只有非本质的意义，其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它們的改变并不影响总原则。我們說对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这就是要我們从多样性的統一中看問題，看看当前特殊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在总体中占居什么地位，具有何种意义。如果它們是起决定性作

用和具有本质意义的方面，那誠然要适应当前特殊的、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对旧的原则作适当的修改；不这样做，不能算是認識了真理的具体性。但如果当前特殊的情况和条件在总体中并不具有本质的意义，那么，尽管表現总原则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却并不因此而影响总原则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如果因为一点不重要的特殊情况和条件的变动，就据以改变总的原则，这也只能叫“抽象思維”，决不是什么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观察，就犯这种“抽象思維”的毛病。他們总是看到帝国主义发展中的某些变动，就作出或者实际上作出帝国主义的本质、本性已經改变，帝国主义的根本規律已經改变的結論，并且按照这种观点去制定策略。列宁說，修正主义者总是“把資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点或某一‘教訓’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論和片面的策略体系”^②；自以为把握了真理的具体性，实际上这是对具体真理的嘲弄。

总之，要想把握具体真理，必須在多样性中发现其間的統一性，必須从一个方面与其他諸方面的錯綜复杂的联系和关系中看問題。根据一个片面便遽尔得出普遍結論，看到一个細小变化便据以改变总的原则，这种方法，貌似具体看問題，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維”，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頁。

②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7—348頁。



論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中 有 关 实 践 标 准 的 若 干 問 題

· 何 祚 庥 ·

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在人的認識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实践是人的認識的源泉，是实现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这一飞跃的基础，也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确的标准。社会实践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澤东同志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①。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直接影响的是生产活动和科学活动。生产活动不只是向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种种需求，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也直接地影响認識自然界的过程。毛澤东同志写道，“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②。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科学知識的积累，大多数是通过物质的生产活动而获得的。只是当“工业巨大地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紡織、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透鏡制造)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給与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工具，并使新的仪器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說这时候才第一次可能有真正

的系統的实验科学”^③。

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专门以系統研究自然界为直接目的的科学实践活动，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发展，也是人类对自然界認識的一种进步。因为这类活动得以更系統、更深入、更精細地研究自然界，从而扩大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自然科学的实践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实验，另一类是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的特点在于它能挑选出生产过程或自然界中的典型現象，安排在人工所能控制和改变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强化所要研究的有关現象，排除那些次要或无关的因素，使用实验仪器、测量工具等，对不同条件下的自然現象变化規律进行精細的研究。科学观察也是实践的一种。列宁曾特別指出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④。科学观察的特点在于它在不改变自然条件的情况下，挑选出自然現象中的某一部分，有时使用若干輔助的设备，按照一定的目的，系統地对这些現象进行观

①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272、271頁。

③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0頁。

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頁。



察、記載、描述或把它拍摄下来。由于这类科学观察活动是有系統有目的地进行的，并有科学仪器作为輔助，因而較之人們的一般观察更能深入一步，更能发掘出現象的内部联系。当然，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这两类科学活动实际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实验过程中，必然要对实验中产生的现象进行观察。在观察活动中有时也要用某些实验仪器作为輔助的工具。总之，这两类科学活动都是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在有些部門中，实验研究的比重要大一些，如物理学和化学。在有些部門中，科学观察的成分較多一些，如天文学、解剖学方面的研究。

科学活动在发现和发掘事物的規律性方面，比起生产实践确有便利的地方。但在解决实际生产中的技术問題时，如果只依賴实验活动所积累的知識，却是不够的。特別在較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各种实际因素較多，在实验活动或科学观察中，常常不能对这些具体因素一一进行詳尽无遺的研究，因而由科学实践得出来的具体結論，便不一定能够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也就是說，科学活动仍有局限性，它并不能代替生产活动本身。人們在具体解决这类問題时，还常常需要把生产活动和科学活动結合起来。

社会实践是自然科学中 檢驗真理的客观标准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問題是很早就提出来了的。然而直到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这个問題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得到解决。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社会实践是檢驗自然科学理論是否符合于客观实

际的标准。离开了这种实践标准，就很难判断自然科学理論是不是客观真理。毛澤东同志指出，“許多自然科学理論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們創立这些学說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①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应用馬克思主义所主張的实践标准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唯心主义者常常散布这种或那种不可知論的观点，宣揚科学真理是不能被認識的。例如，在有机化学发展初期，曾广泛流行有机化合物是不能人工合成的观点，认为有机化合物是有机体的产物，而有机体的生命现象是不能認識的。在天文学上，唯心主义者孔德曾断言星球上的物质成分不能被人認識，因为人們无从获得进行化学分析的材料。在物理学上，又有若干馬赫主义者否认原子的实在性。甚至在現代的心理学文献中，有时也还出現心理活动規律不能被人認識的論点。对于唯心主义者的这种不可知論，恩格斯曾指出，“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謬論駁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对于有机化学上的不可知論，他又駁斥道，“例如含茜草的色素——茜素來說，我們現在已不是从生长在田野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②。实际上，原子論已經为現代物理学的实践所充分证实。天体上包含的物质成分已由光譜分析所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頁。

② 《费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15頁。



判明，并发展了天体化学这一門科学。至于大脑神經活动，正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对象，現在虽只是初步地了解到它的若干規律性，但人們經過科学实践也将最終地闡明它的規律。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总是把这种“自在之物”轉变为“为我之物”。彻底駁斥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者的不可知論的最好办法，便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实践。

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張的实践标准，和馬赫主义者所主張的“只有效果才能区分認識与謬誤”、实用主义者宣称“有用即真理”等等观点，存在着原則的區別。对这类錯誤观点，列宁进行了有力的批評。列宁指出：对于唯物主义者，人的实践的“效果”证明着我們的表象与我們所感知的物的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主义者，“效果”是我在实践所需要的一切。正因为馬赫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把“效用”理解為他們的主观效用，因而，在他們看来，自然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他們的主观效用而轉移的。这样就完全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

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可知論，另一方面又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划清界限。不可知論者否认人們有認識客观真理的可能，从而完全取消了自然科学探討客观真理的职能。实用主义者宣揚真理的主观性，从而否认了判断自然科学是否为真理有客观标准。只有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才能提供正确的真理观，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实践标准是邏輯证明的基础

“辯证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实践提到第一

的地位，认为人的認識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認識离开实践的錯誤理論。”^①判断自然科学的理論是不是客观真理，同样也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但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有一类工作看来并不是直接由实践来檢驗它們是否正确，而是用邏輯方法或演繹方法来证明。特别是在数学、理論物理和理論天文学中，常常从一些定义、定理、公理或已知的基本定律出发，运用邏輯推理而导出某一理論系統。那末，这种研究方法是否脫离了实践标准，違反了“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論点呢？

应该指出，在所有的自然科学理論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不論它是由实验事实总结出来的定律，或是在科学证明过程中所下的定义等等，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論这些定义、定理、公理和人們的日常經驗距离得多么远，甚至有些乍看起来还和人們的日常經驗相矛盾，然而它們总是一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离开了社会实践，这些定义、定理、公理也就不能形成。

在数学里面，这种邏輯推理的方法运用得特別突出，因而唯心主义者总爱从数学中举出例子，以便证明科学并不是实践的产物。例如，唯心主义者康德认为“严格的数学命題都永远是先天的判断，而非經驗的判断，因为它们具有不能来自經驗的必然性”^②。

唯心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恩格斯曾就数学和实践的关系，作了充分的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② 《純粹理性批判》。《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学》，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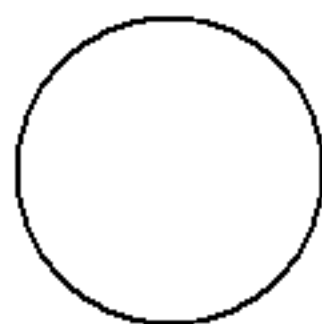
論證。他指出，“和數的概念一樣，形的概念也完全是從外面世界得來的，而不是在頭腦中從純粹的思維中產生出來的。要能達到形的概念，先應當存在具有一定形狀的物體，而且應把這些形狀拿來比較。純數學是以現實世界的空間的形式和數量的關係——這是非非常現實的資料——為對象的。這些資料表現於非常抽象的形式之中，這一事實只能表面地掩蓋它的來自現實世界的根源。可是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东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甚至在數學上的量的相互演算似乎是先驗的，也並不證明它們的先驗的來源，而只是證明它們的合理的相互關係。矩形以其一邊為中心而旋轉得到圓柱形，要得到這樣的觀念，那麼先就須要研究一定數量的現實的矩形和圓柱形，雖然是形式極不完全的矩形和圓柱形。……和所有其他的思維領域一樣，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規律，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就和現實世界相脫離，並且作為某種好似獨立的东西，好似從外面來的規律——世界應當與此規律相適合——而與之相對立。在社會和國家如此，在純數學上也正是如此，而不是別的樣子，它也是往後被應用於世界上來的，雖然它是從這一世界得出來的，並且僅僅反映世界聯繫形式的一部分——僅僅因為如此，數學才能被一般地應用。”^①

在討論到數學中的數學公理為什麼會帶有“不證自明”的性質時，恩格斯曾深刻地分析道：“現代自然科學已經把全部思維內容起

源於經驗這一命題擴展了，以致把它的舊的形而上學的限制和公式完全推翻了。因為承認了獲得性的遺傳，近代自然科學便把經驗的主體從個體擴大到種：每一個體之必須親自去經驗，現在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個別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它的歷代祖先的經驗的結果來代替。如果在我們中間，例如，數學公理對於每個八歲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證自明的，都無須用經驗來證明，那末這只是‘積累的遺傳’的結果”^②。

在以上這兩段論述中，恩格斯對於數學上的概念、定義、定理或是公理和客觀現實世界的關係，它們的經驗基礎等等，都作了透徹的說明。他還特別指出，數學公理之所以似乎帶有不依賴於自身經驗的“不證自明”的性質，也只是“積累的遺傳”的結果。

在數學證明中常使用的邏輯推理方法，也有和數學中定義、公理等相類似的情況。列寧指出，“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③。實際上，任何一個邏輯推理過程，都是自然現象中客觀聯繫在思維中的一種有條理的復寫。所謂邏輯關係，就是事物的客觀聯繫中某種帶有普遍性質的聯繫的反映。這也就是說，這種聯繫不只是在某一個別現象中才具有，而且是在很多的現象中，都存在有類似的聯繫。這樣，人們在思維中便以邏輯的形式反映出這種帶有普遍性質的聯繫。例如，三段論式就是反映了事物的種和屬的包含關係這種聯繫，而以一系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8頁。

②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4頁。

③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頁。



列的特称判断、全称判断的形式组合起来。这种逻辑格式是在千百万次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实践证明它的正确性。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①。从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出逻辑格式确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逻辑的格式,由于它比起初等数学中的公理更抽象一些,所以初入学的儿童是难于领会的,这是因为他们自身还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也还没有来得及从父兄那儿去继承这种经验的缘故。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逻辑对于刚开始研究逻辑以及一般地刚开始研究各种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种科学又反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称赞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是“微妙而深刻”^②。逻辑学的教学经验表明,只有当人们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能深刻地了解这种逻辑格式的正确性,并且只有在思维活动中反复运用,人们才有可能正确掌握这种三段论的格式。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使用逻辑证明方法中作为前提的定义或公理,或者是演绎逻辑本身,都是以经验为基础,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这里,所有的证明仍要归结到实践标准,实践仍然居于第一的地位,只是它们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进行论证的前提是正确的,并且逻辑推理的运用是严密的,那末所得到的结论就一定是符合现实的。

然而,在实际科学研究活动中,并不能常常完满地实现上述逻辑推理的过程。因为

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由于经验材料的不足,论证的前提并不容易保证它一定正确;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逻辑的推理也不容易立刻就做到周密,所以在实际的认知过程中,总是采用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形式。否则,研究就不能深入,思想也不会丰富。即使在数学的研究中,数学家在研究量的问题时,也仍然要采用实践——认识——实践的形式,只是最后叙述它的结果时,才以较简练的逻辑推理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这也不排斥在对一个较简单的事物或对其中某一片段的认知过程中,由于经验材料十分充分,因而有可能直接运用这种推理方法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或者对于某些演绎推理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当经验材料也是十分完备时,对某些较复杂的事物,有时也能运用推理方法而直接写成为数学证明的形式。

数学科学的证明和经验科学的证明,都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数学证明中不需要把直接的经验材料吸收于证明过程之中,而只是通过科学的基本概念、定义和公理中所概括的经验总结来实现它的证明。在经验科学的证明中,除了它也要运用基本概念、定义中所包含的经验总结以外,还必须把直接的经验材料吸收到证明过程本身中去,有时还需要直接返回到经验材料。实际上,这两种证明方法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经验科学中,常常会包含或部分地包含有类似数学证明的演绎推理,这在物理学和力学中是相当普遍的。而在数学中,有时也直接引用经验的事实(当然

①②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97页。



只是数学上的“事实”),如数学归纳法。特别是在早期的数学证明中,严格的公理化体系尚不能立刻建立,因而在证明中便常常包含有直接反映实践基础的“直观”的成分。但不论科学证明采用哪一种形式,实践始终是科学证明中第一的和最基本的标准。

实践标准在自然科学的证明中的具体运用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研究工作中具体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又说,“许多理论的真理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①。

举例来说,达尔文在研究生物进化论的同时,提出“从猿到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应该由实践来判明。当然,由实践来重复这个进化史上的“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做不到的。但是达尔文却提出这样的预见,假如“从猿到人”的假说是正确的,那末在地下发掘的材料中,便应当发现有中间过渡现象,即有所谓“类人猿”遗骸的存在。后来,地下发掘材料果然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说,把达尔文的“从猿到人”的理论,应用于地下发掘的实践,而实践果然“达到预想的目的”,因而证明了“从猿到人”的理论是正确的。

上述这个例证说明了实践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一般原则。但是在科学工作中,有时

却会发生一些复杂情况。例如,在科学工作中,有些人也希望通过一些实验,来推翻一些现在公认为正确并且经过大量实践证明的理论,如能量守恒定律、量子力学的定律等等。甚至从初步的实验结果看来,似乎已经得出和这些定理、定律的预测不相符合的结果。那末,是否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理论观念包含着错误呢?怎样来解释这些“实验”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实验之间的矛盾呢?这涉及在科学证明过程中运用实践标准的若干较具体的问题。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实践“证明或驳倒”某一科学理论时,要求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而在不满足这些条件时,所谓“证明”或“驳倒”便常常是一种假象,因而有时便产生一些看起来是矛盾的现象。

首先,在应用实践标准于科学理论的检验时,必须要求科学实践,具体说来就是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不包含有科学上的错误。只有当科学实验或科学观察进行得正确的时候,才能做出可靠的结论。实际上,在一两次没有经过科学分析和检验过的“个别”的实验结果或对“反常”的事例的观察中,往往可能包含着科学上的错误。在科学工作中,我们是非常重视这种反常的例外事件的,因为这类事件里含有新的发现的可能。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反常”事件其实是并不反常的,它往往是由于实验工作中某一方面的疏忽而造成的结果。因此,在处理这类事例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然而即使对实验工作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仍可能产生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2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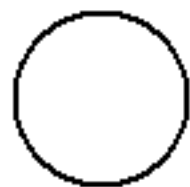
錯誤。在科学史上，常发现有錯誤的實驗。举例來說，在前几年从 π 介子对核子散射的實驗里，发现實驗結果和由微观因果律出发所預期的實驗結果有所不同。因而有一些人就由此做出微观因果律不适用于微观世界的結論。然而曾几何时，却发现原先賴以作为根据的實驗做得不够准确，而新的、更准确的實驗却证明微观因果律仍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确有一些人在上述錯誤實驗結果的影响下，作推翻微观因果律的尝试。当然，这类企图不仅在科学上缺乏根据，从哲学上讲也是不正确的。以上这个实例可以提醒理論工作者，对于實驗材料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必須以可靠的實驗材料作为理論工作的出发点。

第二，有时科学實驗和科学观察虽作得很正确，也还不一定保证能判明某一科学理論是正确还是錯誤。在科学史上也有由正确的實驗做出了錯誤結論的例子。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原子核物理的研究里，发现由 β 衰变产生出来的电子能量要小于由原子核释放出来的能量。这个實驗結果是經過小心檢驗过的，是正确的。于是有一些理論物理学家便据此而做出了能量守恒定律在微观世界里被破坏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結論。这个結論当然是十分“惊人”的。能量守恒定律不仅仅在宏观世界里有深厚的實驗根据，在微观世界領域内也有大量實驗的证明，而且它还是哲学上运动不灭定律的科学基础。为什么在 β 衰变的过程里会产生这种“反常”的现象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原来这里并不是能量守恒定律受到破坏，而是由一个中性的不带电的中微子带走了能量。只是在当时的

實驗条件下，很难直接观察到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中性粒子。由此可见，由實驗事实来“证明或駁倒”一个理論，并不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中間常要包含若干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引用實驗材料来檢驗理論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實驗事实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来。

在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中，要求把實驗事实和理論分析結合起来。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脫离了实践标准而走向“理論标准”。馬克思主义从来是主張理論和实践的統一，这也就是說，理論必須联系实践，而实践也必須以理論为指导。实践要以理論为指导，这一点正是馬克思主义和經驗主义相区别的地方。事实上，一个科学實驗的进行，总是为了解决某一自然現象中这个或那个弄不清楚的問題。具体說来，它总要驗證有关这个自然現象的各种可能的假說中哪一个是更接近于真实的。为了弄清楚这些問題，必須在實驗安排上照应到不同观点，而这就必須同时进行理論分析。只有当科学实践和理論分析結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实践檢证真理的作用。

第三，在引用实践材料来檢驗自然科学理論时，除了要把實驗事实結合理論分析以外，还必须要求由實驗結果到引伸出科学結論之間，在邏輯上是完整而沒有漏洞的。形式邏輯的知識告訴我們，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可以导向新的結論。假如导向結論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而实践却证明結論是錯誤的，那末它所依据的前提必有一个是錯誤的。但假如实践证明結論是正确的，那末即使在推理上沒有錯誤，却并不能由此就作出两个前



提都是正确的結論。因为也有可能由其他前提导出这一个結論。因此，在引用經驗材料来证实某一理論时，必須看到其中在邏輯推理上能否提供这种确切的判断。

相傳在十九世紀上半叶在法国科学院的某一次年会上，数学家泊松和物理学家佛累涅尔之間，就光的波动和微粒的学說展开一場爭論。佛累涅尔是光的波动学說的奠基人之一，而泊松却是微粒学說的拥护者。在年会上，两人各自提出他們的論据。泊松用来反駁波动学說的一个重要論据是：如果由佛累涅尔的波动学說出发，應該做出下面的一个推論，就是利用波动学說的数学公式，可以計算出一个点状光源所放出的光可以繞过一个小圆盘而焦聚在圆盘后面暗影中的中央；但在泊松看来，这个推論，是和光的沿直綫进行的現象相矛盾的，因而便据此指出波动学說的錯誤。然而不久，佛累涅尔却按照泊松所指出的这个推論，做了一个实验，实验結果表明圆盘暗影的中央果然存在一个亮点。看来，波动学說已經取得了胜利。然而，泊松并不因此就承认波动学說的胜利。因为这个現象也可以用微粒学說来解释。按照微粒学說的原理，光的微粒在走过圆盘的边缘时，将受到圆盘边缘的吸引力，而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因而最后也将焦聚在某一亮点。圆盘衍射的实验固然說明波动学說是正确的，但它却并不能排斥微粒学說的正确性。^① 由此可見，即使某一实验結果已經证实了由某一理論引伸出来的預想的結論，但在邏輯的分析上，由另一个理論也可以解释这个現象时，

实践仍难从两种理論之中肯定哪一个理論是正确而无誤的。

初看起来，由实践来推翻一个定理或定律，可能比证实某一定理、定律要容易一些。形式邏輯的知識告訴我們，证明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要考虑到所有的实际情况，而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却只要一个簡單的“例外”就行了。但实际上問題並沒有这样的簡單。因为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題，就必須肯定一个新的和这个命題相对立的实验事实。而在肯定一个新的实验事实过程中，仍然必須要清洗有关这个实验事实的各种假說。例如，我們在前面举出的对于 β 衰变放出电子能量测量的实验中，解释这类現象最简单的假說便是：电子由于碰撞或輻射等等原因，损耗了能量，因而实验上所观察到的能量不守恒只不过是能量的轉移而已。为了要排除这种假說，当然就得重新設計实验，重作測量。直到后来，实验上采用了直接測量 β 衰变过程中放出的热值的办法，也就是說，把所有电子的能量，包括它轉移为別种形态的能量，都測量在內，这样，才把上述这些簡單的假說排除了。但是它仍然不能排除最后一个假說，即可能存在一种看不見、摸不着的中性粒子。进一步的实验却证明这个假說是对的。由此可見，由新的实践来推翻一个全称肯定命題时，也同样要求邏輯上的完整性和排它性，在这里，只运用形式邏輯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① 参看庫德耶符捷夫：《物理学史》第1卷，国家教育出版社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12頁。



第四,在运用实践标准于科学证明时,有时还会遇到不同的实验结果似乎是相矛盾的情况,就是这一类实验支持这一个理论,而另一类实验又支持另一个相反的理论。例如,在光的波动学说对于牛顿的古典的微粒学说取得了胜利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光的量子学说。在波动学说和量子学说并存的时候,一方面有光的干涉、衍射、折射等实验支持光的波动学说;但另一方面又有光电效应、光在自由电子上的散射、联合散射等一套实验支持光的量子学说。现代的原子核理论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在满壳层原子核附近有一系列实验支持所谓“壳层模型”,另一方面大变形原子核附近却又有一堆实验支持所谓“综合模型”。此外,也还有其他核模型,如“超导模型”、“集团模型”、“非轴向对称模型”等等,都各自有它的实验基础。这样,由实验来判明理论正确与否的课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此外,不论实验或是理论,都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在科学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形,初看起来一个实验已能驳倒某一个理论,但由于科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在这个理论中又发展出新的因素,从而又能完满地解释这个实验事实。有时一个实验结果看来是支持某一理论的,但进一步提高了实验精确度以后,却又发现这个实验原来是反对这个理论的。

正因为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在科学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笔墨官司”。甲说,“我的实验如何驳倒了那一个理论”;乙说,“不行,你的实验中有一些因素考

虑得不周全,或理论上的根据不充足”,等等。这类争论是极多的,有的争论甚至延续了上百年。所以,由实践来判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或错误,必须照顾到种种复杂情况。把科学证明的任务简单化,就只会导向错误。事实上,当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各种矛盾现象将进一步展开,理论和实验材料之间的尖锐冲突进一步明朗化。这时,常常会找到若干“确证”,提出一些足以肯定地判明是非的实验,或者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它能概括所有相矛盾的那些实验事实。例如,在早期的光的波动学说和微粒学说的争论中,佛累涅尔在科学问题的辩论上虽然取得了优势,但波动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是到后来,佛累涅尔又进行了一个由两面镜子同时反射一个光源而发生干涉现象的实验,这种现象已不能用牛顿所主张的微粒学说来解释,这样,由于实验上提出了这种“确证”,所以波动学说才对微粒学说取得了胜利。对于后来的光的波动学说和量子学说之间的矛盾,一直到量子电动力学发展起来以后,才从理论上统一地加以解决。在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中,它一方面吸收了量子理论中的重要精髓,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波动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统一地用一组算式来处理光的量子的和波动的性质,因而它不仅能解释上述所有各个实验,而且能定量地计算出各个实验结果,预言新的现象。这样,光的量子学说和波动学说,就发展到更高的理论阶段。然而在原子核理论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能结束上述各种模型争鸣的状况,尚



有待于原子核物理学家的努力。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工作者常常喜爱从事一些足以进一步尖锐地揭发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的实验工作和理论分析，或者进行足以肯定地判明是非的实验，和结束纷争局面的理论研究，这是一种推动科学研究前进的重要方法。这类工作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常常能使自然科学的理论走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列宁在论述实践标准时，首先肯定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同时，他强调指出：“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他一方面指出实践标准有绝对性，足以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之间的界限，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实践标准有相对性，告诫我们不要把实践验证过的知识看作是“绝对”的。

认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确证只是相对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的近似程度内，一定的意义上，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或理论中的哪一部分是正确，哪一部

分却含有错误。

为什么实践标准具有这种相对性呢？任何理论都只是客观实际近似的反映或模写，任何实践总是在一定空间、时间和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具体实践是要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而由具体实践概括出来的普遍理论就并不一定具有那样的“普遍性”，它要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而在每一阶段上的理论认识只能是近似地反映着现实的相对真理。

科学史上有不少理论随着实验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事例。例如，在化学元素论的发展上，普洛特曾提出一切元素都是由氢做成的假说，并认为它们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整数倍数。在当时确有若干实验事实支持这一论断。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有很多元素的原子量并非氢的整数倍数。因而普洛特的假说，就被搁置在一旁了。但是，后来又发现原来所谓化学元素的这些原子，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好多个化学性质相同但重量不同的同位素，而这些同位素的重量却是氢原子的整数倍数。这样，实验又转回到支持普洛特的假说。但是，更精确的实验又表明，这些同位素是氢原子重量的整数倍数也只是近似的，实际上，它们有微小差异。其原因是因为组成这些同位素的，除了有氢原子核以外，还有中子，并且它们有不同的结合能。因此，近代关于原子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143页。



结构的学说，又进一步发展了普洛特的假说，但是它的具体形态比起普洛特的原始模型大大地不同了。

由普洛特假说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上理论观念的变革，常是很激烈的。在不同水平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便建立起不同的自然科学理论。每一种理论都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实际。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早期有关原子量测量的化学实验并没有能充分证明或驳倒普洛特假说。因为那时对于一个元素究竟只包含一种原子或几种原子的問題，还没有弄清楚。可以说，这方面理论观点变化得如此激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科学研究不够深入（实际上是当时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引起的。但是就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来说，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例如，牛顿力学在人们日常生产实践中、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中，确实得到大量的实践证明它为正确。但到了人们能处理那些速度能接近于光速的粒子以后，却由新的实践表明，在高速运动下牛顿力学要作相应修改而发展成为相对论。而过去实践所证明的牛顿力学仍然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近似正确的相对真理。由此可见，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問題在于人们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尽有可能出现新的实践条件，在这种新的实践条件下，原来的理论就可能显得陈旧。因此，我们在科学工作中必须看到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不应抱迷信

的态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根本不能证明或驳倒任何理论。实践标准仍然有绝对性的一面。实践仍然是判断自然科学理论是否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种判断，仍然可以和不可知论及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学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这种已经有大量实践为基础的绝对真理的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新的实践只会丰富或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或者进一步给这个理论划定它所能适用的界限。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固然代替了牛顿力学，它指出牛顿力学中不足之处，但它同时又证明了牛顿力学在物体运动速度比光速小很多的条件下，仍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相对论只是更精确地为它规定了适用的范围。

由牛顿力学发展为相对论的这个事例，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自然科学理论中的继承关系。相对论并不是简单地废除了牛顿力学，相反地，而是把牛顿力学概括在内，作为它的一个特殊情形。当物体的运动速度变成缓慢时，相对论就自动地还原为牛顿力学。也就是说，在速度较缓慢的条件下，牛顿力学仍然作为客观真理而被保留了下来。可以说，那些经过大量实践检验过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常常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原因是在于这些理论确实有实践的根据，它虽然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实际，但其中却包



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自然科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必須把這部分繼承下來。因此，當我們對前人的工作進行批判的審查時，必須對它的實踐根據有充足的估計。假如我們的科學實踐仍然處在前人的實踐所達到的範圍以內，那就不可能期望在這個範圍內推翻任何自然科學上的定律（除非前人工作包含有錯誤）。例如，在原子光譜、分子光譜的領域中，在一定的實驗精確性的範圍內來推翻量子力學的定律，在有限世界內“創造”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永動機等等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這就是企圖否認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否認實踐檢驗過的相對真理中包含有絕對真理成分，而這將導致從根本上否定客觀真理的存在，從而陷入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

在自然科學上，看來也確有一些基本定律曾被“推翻”過，如宇稱守恒定律。但是，宇稱守恒定律之所以被“推翻”，並不是因為過去的實驗曾經證明它正確，而現在的實驗卻證明它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這裡並不是宇稱守恒定律被推翻，而只是看起來似乎是在弱相互作用過程中被“推翻”。經過仔細的理論分析，發現過去表面上似乎証實的“宇稱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過程里卻並沒有實驗的根據，也就是說，實踐從未證明過“宇稱”在弱相互作用過程里守恒。而相反，當時卻有一些不太確定的實驗現象似乎說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可能不守恒。這樣，一些理論家就建議進行足以確切證明它守恒與否的實驗，來加以檢驗。而實驗的結果却

表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是不守恒的。因此，所謂宇稱守恒定律被“推翻”，實際上恰好是由新的實踐為宇稱守恒定律規定了新的應用範圍。曾經由大量實踐證明的如在電磁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卻仍是守恒的。至於包含奇異粒子在內的強相互作用過程，宇稱是否守恒的問題，由於現有實驗材料尚不夠充分，暫時還不能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判斷。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守恒定律被破壞的這個事例，說明進行科學理論工作時一刻兒也不能脫離實踐標準。切不可把已經有實踐證明的理論當作是還沒有證明的，也不可把未經實踐檢驗過的“假說”，當作已有實踐證明的理論。如果離開了實踐標準這個工作中的指南針，那末我們在理論上將得不到任何可靠的結果。

總之，科學理論是在實踐不斷豐富和變化的基礎上發展着的。實踐不斷地批判那些陳舊了的科學理論和學說，新的理論又在繼承舊理論的基礎上不斷從實踐中吸取營養資料。如此不斷地循環不斷地創造，科學也就日新月異。而自然科學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實踐，都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引用實踐標準於自然科學理論的檢驗時，必須注意到實驗材料和觀察材料的可靠性，和理論分析在邏輯上的嚴密性和完整性。實踐標準有相對性和絕對性。經過實踐檢驗過的客觀真理，仍然只是近似地反映現實的相對真理，但在相對真理中卻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隨着實踐的新的進展，自然科學理論也向前進展而達到新的高度。



謙虛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

吳介民

共产党人是阶级斗争的勇敢战士，他们代表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在争取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斗争中，是英勇顽强的；在和反动的、腐朽的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克服一切困难、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共产党人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普遍真理。他们在为实现真理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当仁不让，明确地对各种错误的意见表示态度，而不是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但是，另一方面，在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共产党人则是十分谦虚和谨慎的。无产阶级的谦虚绝不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那种待人接物中的表面的客套和庸俗的虚伪，而是一种对真理的严肃态度。

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为前提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只有正确地反映了

客观实际，使主观思想和客观外界相符合或大体上相符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行动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人们的思想反映客观世界，是通过作为思维器官的头脑进行的。人脑好比一个加工工厂，它的原料只能来自客观外界。要使我们的主观思想和客观外界相符合，就必须首先向客观外界取得丰富的原料，然后才能进行科学的加工，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认识它们。也就是说，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这里，就有个谦虚的问题。

一个谦虚的人，在和客观实际接触，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总是“虚怀若谷”，对客观事物不带任何主观成见，他就能在客观材料的面前，敞开着头脑这个加工工厂的大门，让客观材料通畅无阻地源源不断地进到里边去。“山以虚则能受泽，心以虚则能受人。”谦虚的人的头脑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来自客观外界的东西。这样，他就能客观地观察外界的情况，能够详细地占有材料，使头脑这个加工工厂完成加工过程，对客观材料作出科学的判断，从而使思想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订出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



法。相反地，如果一个人驕傲起来，让他的头脑为主观的成見所充塞，把接受客观材料的門戶关闭起来，就会耳不聰，目不明，对客观事物視而不見，听而不聞，失去敏銳的辨別能力，甚至对客观外界的东西加以排斥或者加以主观的歪曲。結果，头脑这个加工工厂就会因为没有原料，或原料不足，或原料不好，而做不出成品，即使勉强制造出来，也是蹩脚的东西。

謙虛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的謙虛就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謙虛既不是对客观事实加以夸大，把一分說成二分；也不是对客观事实人为地縮小，把二分說成一分。而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多不少，恰如其分。恩格斯說，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①，也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尊重客观实际，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实际，这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謙虛。

我們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設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主体。所以，尊重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来說，也就是尊重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經驗出发，恰如其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見和要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調查研究，是正确反映人民群众意見的基础。要做好这一点，必须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这里特別重要的是：

一方面，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創造力，重

視人民群众的实践經驗。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創造历史的动力。在我們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創造性，是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決定因素。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設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經驗和知識，是我們制訂方針、政策、计划和方案，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像毛澤东同志所說的那样：“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②

另一方面，要清醒地估計自己，敢于正視自己的不足，不要以为什么都懂得了。不懂的东西就要承认不懂，放下架子，虛心向群众学习。共产党人的責任是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設的斗争，但要领导群众，首先必須向群众学习。只有先做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当然，人民群众的意見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它需要我們加以整理、分析、概括和提高。但是，离开了向人民群众学习，离开了对人民群众意見的調查研究，絕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毛澤东同志告訴我們：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应当“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

① 《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頁。

②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頁。



途有远见卓识”^①。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②。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向实际学习，不向群众学习，是最大的骄傲；老老实实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乃是最大的谦虚。

二

服从真理，坚持真理，承认错误，修正错误，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态度。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内容。人们的认识按它的本性来说，是能够掌握客观真理的。但是，要掌握到真理，要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必须和错误的认识进行不断的斗争，真理才能确立和得到发展。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③。我们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个真理发展的规律，坚持正确的东西，修正错误的东西，力求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

对真理的态度不是人人一样的。在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态度的正确和错误，往往和他们的阶级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分析对同一事物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发生不同或相互对立的意见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阶级立场，不能不注意到阶级意识的影响。历史上一切反动的没落的阶级，由于他们阶级利益的局限，往往对客观事物不能取得或不能完全取得正确的认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来歪曲真理，抹杀真理。这就是一切反动的没落的阶级，不是骄横自大，就是盲目无知的原因。只有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才最能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为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认识，除了阶级根源以外，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但常常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客观事物的本质一时不可能充分暴露的限制。因此，站在同一阶级立场或同一政治立场上的人们，由于工作地位不同，实践经验不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511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掌握材料不同，認識水平不同，對一件事情也會產生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認識。這是充滿矛盾的客觀現實的反映，不足為奇。認為對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種看法，不能有別一種看法，只能有一種意見，不能有別一種意見，是不切實際的。

各種不同意見的出現，在一般的情況下，都各自反映了客觀事物的各個不同側面，有的甚至只是對某一個側面的歪曲的反映。認真地听取這些意見，就能夠幫助我們比較全面地認識客觀事物。即使是那種對某一個側面的歪曲的反映，也能促使我們注意這一個側面的存在，正確地加以認識。列寧說：“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①。我們把各種不同的意見集中起來，就可能避免陷入片面的認識，把幾種不完全的認識加以比較、分析、取舍、補充，就可能得到較為完全的認識，從而求得客觀真理。如果對不同的意見充耳不聞，就容易只見局部，不見全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使我們的思想僵化起來，犯主觀片面的錯誤。所以，在我們工作中，在我們向群眾進行調查研究過程中，認真地听取各種不同的意見，就是十分必要，而不是可有可無的了。

傾聽別人的意見，不能擺起架子，而必須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真理在哪裡，就倒向哪裡，誰有真理，就贊成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人民的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同志式的平等關係，人們在職務上有分工的不同，但他們的社会地位並沒有

實踐之分。一切共產黨員和工作幹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務員。一個人的職務只是標誌着他的工作責任，而不能先天地帶給他任何知識和經驗。因此，我們要謙以待人，要有服從真理的精神。對於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的人，不管他是誰，工人也罷，農民也罷，你的同級也罷，你的下級也罷，先進分子也罷，落後分子也罷，你喜歡的人也罷，你不喜歡的人也罷，只要真理在他手裡，他說出了真理，我們就應當毫不猶豫地贊同他。

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人們的喜、怒、好、惡為轉移。人們不能把真理說成是錯誤，也不能把錯誤說成是真理。一切顛倒是非的說法，最終將會被客觀的事實所駁倒或糾正。因而對真理的認識不能摻雜着個人的成見。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②這就告訴我們，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探求真理，堅持真理，為真理而戰鬥。同時這也告訴我們，不要把認識絕對化，要隨時根據人民群众的經驗，檢驗已經得到的結論，要隨時反復考慮各種不同的意見，對已有的認識加以審查，當我們一旦發現自己的見解不符合實際，真理在別一方面的時候，而能夠以

①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頁。

②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6頁。



人民利益为重，毫不躊躇地向真理低头，进行自我批评，修正自己的错误。

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同样，作为对客观实际反映的人的认识，也是一个无限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永远不能穷尽对于客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永远不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真理。毛泽东同志说过：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领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认识为极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学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等待我们去认识、去解决。因此，不论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真理，不论我们已经获得了多少经验，不论我们已经积累了多少知识，也不应当骄傲，在新的事物面前，在新的问题面前，在新的任务面前，仍然必须采取谦虚的态度。事事谦虚，处处谦虚，时时谦虚，永远谦虚。这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对革命者提出的要求。

三

谦虚和骄傲是相互对立的。

骄傲和自满是学生东西。骄傲必然来自自满自足。有骄傲情绪的人，往往自以为了不起，容易因工作上的一些成绩而冲昏头脑；往往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为自己的一孔之见所障蔽。于是，就不再愿意去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了。其结果，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使思想一天天僵化，革命意志一天天衰退。这无异于自己筑一道篱墙，把自己孤立起来，堵塞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骄傲是一种对自己盲目的过高的估计。骄傲必然自高自大，排斥别人。有骄傲情绪的人，往往夸大个人作用，不把群众和别人放在眼里，不重视群众和集体的力量。他们往往自视特殊，固执己见，甚至把自己工作的单位变成独立王国，不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们在工作有成绩的时候，把功劳全挂在自己的账上，在工作出毛病的时候，把错误全推给别人。在骄傲情绪支配之下，上级和下级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同志和同志之间，就不可能结成统一的整体，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页。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①

骄傲还和轻率相联系。一个人骄傲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了，什么都能行了，什么都不在乎了，那末，他在处理工作或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没有弄清楚情况而轻率从事。由于主观意图和客观现实对不起头，结果非碰壁不可。这必然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害。

谦虚和谨慎是伴随着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谨慎，当然不是指那种只热衷于小事、忘掉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谨小慎微态度，也不是那种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的优柔寡断态度，而是指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一种高度责任感。我们所说的谨慎，就是要求对革命工作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多谋善断。具有这种态度的人在沒有进行调查研究，沒有弄清楚情况时，不随便下决心。他们总是十分尊重群众的意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考察情况的时候，力求做到详尽、仔细、确切；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力求做到全面、周密、深刻。这样，使主观思想、意见、计划和办法尽可能准确、完备地反映客观实际，使工作胜利得到较多的保障，少犯或不犯错误。

今天我们党是处在全国执政党的地位，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都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工作做的好或不好，都会给国家人民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对工作要更加谦虚谨慎，踏踏实实，深思熟虑，慎重从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谦虚谨慎和骄傲是不相容的。骄傲是一种落后的因素，是一种不利团结的因素，是一种导致失败的因素。不去掉它，就有碍于我们革命队伍的团结，不去掉它，就无法使我们继续进步，不去掉它，就不可能把我们工作推向胜利。

四

谦虚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高贵品质。这种高尚品质，鲜明地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活动中，也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中。

在这里，我们略举几个事例。从这些具体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最善于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同对待真理、对待人民的谦虚态度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

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他从不以不懂装懂，冒充内行，而总是正视自己知识上的缺陷，虚心地勤奋地进行学习。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所谓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以掩饰，在和《奥格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

^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页。



身作什么判断。”^①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为了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发言权，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②，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自一八四三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还在资产阶级统治全世界的时候，马克思就敢于向资产阶级挑战，宣称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的出路和树立了斗争的胜利信心。

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永远严格要求自己，但对于别人任何一点成就都充分加以尊重。马克思曾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于工人也还是不够好。他对于每一种准备发表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力求其完备，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他的稿本。关于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这本书，他就曾修改、重写过三次。马克思绝不抹杀别人的功绩，对于那些对发现真理有贡献的人，他都给予应得的重视。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引用了许多不出名作家的话，由此而使这些人的贡献和他们的名字得为世人所知晓。马克思认为，指出第一个发表某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人都更精确的作家的名字，是他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恩格斯处理他和马克思关系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那种恰如其分地估计自己

同别人的作用的当仁不让和谦逊为怀的精神。恩格斯在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事实，和他对这个革命理论创立所起的作用。他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③又说：“我与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个时期以前和这个时期以内，无论在创立这一理论方面，或特别是在阐发这一理论方面，我都作过某些独立的参加。”^④但是，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始终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恩格斯说：“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主角。”^⑤恩格斯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上，冠上马克思的名字是有理由的。恩格斯这些意见，并不是什么客气，而正是如实地反映了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般说来是十分正确的”^⑥。恩格斯总是认为人们给予他的荣誉，主要应当归功于马克思。

列宁一向反对自高自傲，故步自封。他说：“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

①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页。

③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④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32页。

⑤ 《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5页。

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点什么”^①。又说：“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②。列宁是最谦虚的人，也是最善于学习的人。他不只是善于向书本、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在实际斗争情况发生变化时，“和马克思商量”；同时他又善于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列宁周密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新经验，而把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于新条件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摧毁了世界反动势力的重要堡垒，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无数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始终不懈地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他们是寸步不让的。而同时，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在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制定政策和策略的时候，表现了最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反复地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所提出的理论、政策和计划，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中，同样表现着这种战斗精神和科学态度。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制定了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这也是和他的谦虚谨慎作风分

不开的。在这里，我们重读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所说的一段最朴素、也是令人最感动的話，就会更加深刻、具体地了解革命领袖那种虚怀若谷、谦虚质朴的崇高品质。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③毛泽东同志这种高度的谦虚，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高的榜样。

今天，我国人民正在辛勤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其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继续发扬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不断发扬谦虚谨慎的作风。我们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兢兢业业，慎重从事，来不得丝毫的自以为是，粗心大意和轻率任性。只有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干部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挥干劲，奋力上进，才能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

①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2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1页。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李 潤 之

一

我国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执行这种制度，可以把集中领导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统一起来，既加强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又实行自下而上的严格监督，保证全面地完成生产计划，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

在国营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属于全民的财产；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和各项重要的经济、技术指标，也都是由国家或经济领导机关确定的。因此，企业的一切生产活动，必须受国家计划的支配。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不能像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使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职权，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并不妨碍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相反的，办好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是具有一定权力的机构。它可以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财务、技术、劳动工资计划。它可以审查和讨论企业的奖励基

金、福利费、劳动保护经费、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经费的开支，在不违背上级机关指示的条件下，还可以就上述范围的经费开支作出决议。它可以对企业的任何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向上级建议处分或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人员，必要时越级控告。在对上级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它也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必须按期由工会主持召开，不能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日常工作由工会主持。只要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地和恰当地行使上述权力，并由工会加强日常工作，它就能在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发挥作用，保证企业在职工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下，切实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企业的生产计划。

二

吸收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标



志。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者是资本家的雇佣奴隶，“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天才”^①。劳动者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劳动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企业中，工人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的主人。吸收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企业全体职工积极性相结合。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是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一切企业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并且以严格的劳动纪律来保证千百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统—；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扬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吸引群众参加企业管理”^②。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党的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的方针的体现，也是企业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民主相结合的管理原则的一个好办法。全国解放初期，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它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以后，我们党就根据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的方针，在国营企业中建立起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职工代表会议，在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在企业

中贯彻群众路线，并且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改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适当地扩大了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限，实行了代表的常任制。最近几年，在许多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都起了促进生产和改进企业管理的作用。

实践证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的一项具有生命力的制度。认真执行这个制度，可以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生产发展，健全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且有助于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丰富生产经验和解决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问题。

在企业中，一切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工人群众的生产实践。工人的生产实践，是提高生产技术和改进企业管理的源泉。只有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最广泛地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集中职工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来自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先进经验，不断地改进企业的管理工作，才能够把企业办好。职工代表大会正是反映职工群众意见和集中职工群众经验的重要场所。认真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把企业各个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依靠群众来解决企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水平。同时，在职工代表大会的推动下，解决了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企业内部的协作，增进了职工群众的主

①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②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载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主人翁责任感，职工群众就会更加关心企业生产，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有着积极作用。在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实行职工群众的监督，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化的企业，要求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过程更加复杂，企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细密，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就不可能保证整个企业协调地进行生产。所以，企业必须建立一个厂长负责的、统一的、生产行政的指挥系统，必须保证企业行政领导在生产行政管理方面，有效地行使指挥权力。但是，我们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只有经常注意吸取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智慧同领导者的经验结合起来，领导干部在考虑和决定问题、行使指挥职权的时候，才能够减少或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开好职工代表大会，让群众把各种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经过分析研究，使群众的正确意见同领导意图结合在一起，这样，领导上决定问题就能符合实际，凡是应当办而又可能办的事情就可以办好；凡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致因为勉强去办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企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就可以由于领导和群众的密切结合，而更加健全起来。

在企业中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丰富生产经验，也有着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丰富职工群众的生产经验，既是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也是职工群众切身利益所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经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就企业生产来说，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越高，生产经验越丰富，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企业生产的发展也就越快。所以，社会主义的厂矿企业不仅要负责生产产品，而且要负责“生产”新的人。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职工群众的自我教育和对干部的表扬、批评，有利于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通过讨论改进企业管理工作，提出和研究合理化建议，也有利于丰富职工群众的生产经验。

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工作，是职工代表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群众对这项工作从多方面提出建议和批评，对于企业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是一个有力的督促，在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企业生活福利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会更快地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

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事在人为，企业必须从各个方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1页。



面創造条件，保证每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都成为真正解决問題的大会，而不要使它流于形式。否則，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但内容却空空洞洞，即使开了会，也不能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积极作用，真正体现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从当前許多企业的經驗来看，开好职工代表大会，需要注意和解决以下几个問題。

第一，生产是企业的中心任务，企业中的一切工作，都是密切結合生产来进行的。能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是衡量企业一切工作的尺度。从这一要求出发，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把保证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作为根本目的和主要任务。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密切結合生产和直接推动生产的大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般說来，职工代表大会的内容首先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中的主要問題，作为大会的主要議題。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生产是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根据調查，在許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提案中，生产方面的提案占多数。由于职工群众对企业生产全面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交給职工代表大会討論的生产議題，無論是生产定額、技术措施、成本管理、責任制度等等，企业领导都必须向职工群众說明具体情况，以便群众展开討論，提出合理的修改和补充意見。为了不影响生产，职工代表大会的會議時間不宜过长，活动不宜过多。这就要求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使职工代表大会既开得紧凑，又解决問題。

第二，強調职工代表大会密切結合生产

和推动生产，不是說不要去討論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生活福利問題。关心群众生活始終是我們的政治任务。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前提下，安排好群众生活，使群众的生活条件不断获得改善，对于調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农业連續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更需要注意职工群众的生活福利工作。因此，职工代表大会应该切实地討論生活福利工作，并且根据需求和可能做出決議，交有关职能部门去执行。

第三，在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會議，它应该全面地反映企业各个方面、各种人員的意見和要求。这一特点，决定了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必須广泛发揚民主，無論是分配代表名額、选举代表，或者是确定大会議程和組織大会的活动，都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离开了发揚民主，职工代表大会就失去了意义。代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发揚民主的首要标志，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反映出各个方面、各种人員的意見。因此，要保证新老工人、技术人員、科室干部和女工等等，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还要保证代表們能够把企业各类人員的不同意見反映出来，而不只是反映少数先进人物的意見。切实組織代表討論报告和提案，是发揚民主的中心环节。在这里，企业领导应该把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提到职工代表大会上討論和解决。同时，也要討論和解决群众所普遍关心的其他問題。無論是討論生产問題或者生活問題，都要充分发揚



民主，不能只是“干部做报告、群众提保证”，使讨论流于形式。群众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领导干部，是监督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上要保证群众畅所欲言，干部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和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出现某些错误的意见是难免的，只要加强领导，经过充分讨论，正确意见是可以说服那些错误的意见的。

第四，企业领导干部，必须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对待职工代表大会，自觉地认识到开好职工代表大会，是完成企业生产任务的重要条件。有人借口生产任务繁重，不愿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把开会当成负担，或者以干部扩大会议代替职工代表大会，这是不对的。生产任务繁重，不能成为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理由。因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正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企业生产中的—些重要问题，不发动群众讨论解决，生产任务就不容易完成。而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发动群众把问题解决了，就具备了更好的完

成生产任务的条件。这已经是为许多企业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中—项长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企业党委要加强对企业工会的领导，督促工会按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且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教育职工群众在认真监督行政的同时，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另—方面，教育干部在正确对待职工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同时，要在生产中大胆指挥，在行政上严格管理。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同企业一定时期的工作方向有着直接关系，为此，企业党委要提出明确的方针，指导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对职工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企业党委要督促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去执行，从而使职工群众进一步重视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更加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这样，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水平就可以不断地提高，我们的企业就可以办得更好。

